

調整經濟結構 實現香港再騰飛(下)



21世紀已經過去25年，在世界範圍內，所謂純粹自由競爭時代早已過去，香港需要在繼續實施市場經濟的同時，主動發揮從中央政府到特區政府的戰略、規劃和政策效應，構建適應香港現階段的政府與市場積極互動的經濟體制，加快完成實現數字智能時代轉型的基礎設施建設，選擇和確定在急劇變化的區域和全球分工體系中的位置，以煥發香港發展的內在動力，實現香港的經濟振興。



朱嘉明 經濟學家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數智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第四，金融結構失衡。(1) 金融業與房地產業「一體化」。香港金融業在服務業中佔比近30%，主要由銀行業、證券、債券構成，形成金融業與房地產業高度一體化，吸納了香港絕大部分的金融資源。可以說，香港銀行業大體上是為房地產服務的，嚴重脫離香港實業。(2) 金融業沒有向科技傾斜，沒有工業或科技的支撐。與納斯達克相比，是一個相當非科技的二級市場。這樣的結構已經嚴重影響了香港可持續的經濟成長和香港的競爭力，削弱香港福利制度的物質基礎。(3) 傳統金融業務佔比相對較高。香港金融市場在金融科技、虛擬資產等新興領域雖有發展，整體來看，傳統金融業務如銀行信貸、股票現貨交易等仍佔比較大。據香港金融管理局報告，2023年至2024年部分時段銀行信貸總額有所下跌，反映出傳統信貸業務面臨挑戰，而新興業務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還不足以支撐金融市場的多元化結構，金融業務創新和轉型仍需加快。(4) 股市市值規模有限。香港股市不足美國股市市值的十分之一，且成長速度也比較緩慢，嚴重受制於地緣政治和政策等因素。(5) 金融市場流動性不足。據相關數據顯示，港交所雖有2,000多家上市公司，但每天成交量僅1,000億元左右，且絕大部分成交量集中在交易量前100的個股，不少個股全天下幾乎是零成交，大量中小市值股票交易冷清，不同板塊流動性差異明顯。這種情況反映出市場流動性結構失衡，不利於市場的全面活躍和健康發展。(6) 公開募股籌資額下降。2023年香港的首次公開募股籌資額下降了56%，降至460億元，幸在國家大力支持下，2024年香港IPO躋身全球第四、今年有望重返三甲。(7) 零售業金融業的影響顯著。因為內地訪港旅客消費習慣改變，人均消費大幅下降，加之「港人北上」新消費模式興起，不僅對香港零售業造成衝擊，而且對注入消費金融、商業貸款等相關金融業務造成負面影響，形成對客戶結構和業務結構的調整壓力。(8) 金融行業人才結構面臨調整。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的持牌人數自2021年底以來減少了600多人。

總之，香港經濟不僅面臨人口、產業、科技和金融的深層結構的失衡，而且面臨這些結構失衡的疊加，從根本上制約了香港的制度轉型，阻礙了香港經濟的均衡發展。所以，香港的當務之急是在政府主導下，實行旨在實現結構優化的改革和調整。

(三) 設計符合香港經濟發展的政策體系

香港必須有頂層設計戰略規劃和政策體系。政策是戰略的載體。香港通過制定基於實事求是的政策體系，並且在執行過程中不斷調整，以支持和推動香港的經濟轉型和發展。

第一，財政政策。在現代經濟中，政府的財政政策是諸多經濟政策的核心所在。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成績值得肯定，但是，財政形勢是嚴峻的。所以，香港需要調整和修訂中長期財政政策，盡快着手稅制改革，以求增加財政收入，實現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緊密結合，有效向高端製造業、高科技創新和前沿科技基礎設施傾斜。簡言之，香港需要構建支持人工智能時代的高科技產業的財政政策。

第二，產業政策。產業政策主要包括產業結構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產業技術政策和外貿政策等。產業政策的目標是引導社會資源在產業部門之間以及產業內部的優化配置，建立均衡的產業結構，促進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協調發展。上個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前西德和日本戰後重建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工業化，都基於充分發揮了產業政策的作用。香港在港英政府時期，基本排斥了產業政策的功能。近年來，香港開始進入強化產業政策作用的歷史時期。2022年，特區政府發表《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提出推動科技產業發展，實現香港「新型工業化」，強調以資訊化帶動，將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相結合，實現跨越式發展並增強可持續發展動能。2024年，香港特區政府再次推出100億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現在，香港的產業政策需要注重：整合包括教育、科研、資本和企業資源，設立產業引導基金以系統建設創科產業鏈，支援重點企業，協助傳統製造業轉型；發揮創新的溢出效應，開拓內地和海外市場，爭取在十年內實現高科技產業對GDP的貢獻達到20%、和新加坡水平相近。

第三，科技政策。科技政策旨在促進科技研發、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轉化以及科技人才培養等方面。近年來，香港特區政府已經意識到必須制定科技政策，全方位提高香港在科技領域的地位，提高香港創新競爭力。香港科技政策的重點包括：(1) 推動研發平台建設。構建「政、產、學、研、投」的大科學和跨域的合作平台。(2) 吸引海內外初創企業服務機構在香港建立加速器基地。(3) 根據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的前沿領域，

聚焦先進製造、材料、能源、航太科技，以及生命健康科學，構建前沿科技集群。(4) 優化創投基金。重點支持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生命健康科技，以及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的初創企業。(5) 全面開放科技市場、金融市場、人才市場。(6) 完善與大灣區科研機構和科技企業的合作，實現深度融合。(7) 改革教育制度，加大科技人才的培養。同時，大規模引進科技人才。總之，香港要確定和提出符合香港自身情況和潛力的科技政策，在如此競爭的科技時代選擇好自己的賽道。

第四，福利政策。雖然香港福利支出佔GDP的比重約為5.9%，遠遠低於日本福利開支佔GDP的25%水平，但是，日本屬於高稅收高福利的國家，而香港則是低稅收高福利的社會。長久以來，香港奉行低稅率政策，個人入息稅寬鬆，就算是打工仔，月入幾十、幾百萬元，最高只需繳交總收入15%的稅，至於企業與公司的利得稅，最高也不過是盈利的16.5%。以成熟資本主義國際城市的角度來看，如此超低的稅率，在全球範圍內十分罕見。與此同時，香港的福利政策又極為優厚：住房福利及津貼、公共福利金計劃、教育福利、醫療福利、失業福利、退休福利，以及涵蓋家庭及兒童福利、安老服務、康復服務、違法者服務、社區發展、青少年服務、緊急救濟等其他社會福利項目。根據特區政府2024年《財政預算案》，政府預計在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和教育等領域的投入高達3,437億元，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的59.3%。現在，香港需要改革現存福利制度：一方面要嚴格福利制度的管理，激勵就業，不養懶人。根據新規定，15至59歲、身體健康且失業的綜援受助者，除了需要與政府指定的非政府機構會面接受就業支援服務外，還必須每周參與至少一小時的無償工作，直到找到有薪工作或重返主流教育。另一方面，香港需要將提高稅率和改革稅制結構提到日程，縮小與世界高福利國家和地區的差距。

第五，經濟周期政策。通常認為，經濟周期政策是指政府在不同經濟周期階段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以調節和管理經濟活動，避免經濟過度波動，確保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在工業時代，經濟周期就是包括繁榮、衰退、蕭條和復甦四個階段的商業周期。現在，進入到數字經濟和智能經濟時代，因為科技創新不斷強化，工業時代的商業周期節奏已經被徹底改變。以人工智能為例，其技術創新周期已經從以十年為周期縮短到年為周期，現在更以月，甚至周為周期。所以，政府需要設計符合高科

技時代，並且立足近期、關注中期和準備長期的經濟周期政策，協調財政、貨幣、產業和科技政策，既要避免短期措施對長期經濟產生不利影響，也要避免因為未來長期目標標傷現時經濟發展。

(四) 香港和三個基本關係

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落地各項基本政策，香港需要處理好三個基本關係。

第一，重構經濟體制，調整政府、市場和企業的關係。自香港1841年開埠直到1990年代末，香港始終實施的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並以自由市場的優勢和開放、高效、公平的營商環境而聞名。與亞洲四小龍的其他三小龍比較，香港經濟成長少有政府政策和其他行政手段的干預。2024年，總部位於溫哥華的菲沙研究所發布《世界經濟自由度2024年度報告》，香港榮獲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體的稱號。但是，現在香港需要理性地結束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接受政府對經濟實行干預和引導，將「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結合在一起，以提高香港的競爭能力。例如，香港經濟可以考慮實施「五年計劃」，且與國家的「五年計劃」加以協調。「十五五」就是香港開始引入五年計劃的契機。

第二，重構空間經濟，調整香港、內地和國際的關係。香港土地面積1,119平方公里，市區平均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21,000人，是全球人口密度第四高的地區。香港要發展，需要突破香港空間局限於土地面積的傳統思維。(1) 香港需要加強與灣區內地城市的全方位合作和融合，顯著緩和過高人口密度壓力。(2) 香港需要建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和融合，建立跨國和跨地區的市場關係和合作體系。(3) 香港需要發展低空經濟和海洋經濟。(4) 香港需要通過數字和人工智能技術，構建數字空間和智能空間。為此，需要全面建設支持數字空間和智能空間的全新的基礎設施。

第三，重構創新模式，調整科研、教育、資本的關係。在21世紀前後，香港在金融創新方面成績斐然。但是，在其他科技領域的創新和突破乏善可陳，導致香港經濟發展缺少深層動能。香港的當務之急是：(1) 建設不同層次的創新平台，扶植和培育引導科技前沿的世界級科技企業。在人工智能大模型領域，香港需要有所作為。(2) 改革教育體制。以提高學生創造力為目標，全方位引入人工智能，對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學制、教材和師資做出有計劃的改革。(3) 推動資本與科技的結合，成為亞太地區和全球的科技資本中心。

香港具有歷史形成的優勢。但是，香港優勢不是靜止的和固化的。在1997年之前，香港經濟治理嚴重受制於古典經濟學傳統「自由放任主義」的思維模式，導致香港失去形成高端製造業和奠定高科技產業的歷史機會，經濟增長過度依賴金融業和房地產業為主體的服務業，影響21世紀以來香港形成持續增長的品質，造成香港非均衡的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這是深刻的歷史教訓。(續昨日，全文完)

民主黨解散是歷史必然

李梓敬 立法會議員



曾經是「泛民」最大勢力的民主黨，昨晚宣布解散，這是其長期勾結外部勢力、參與違法活動、破壞香港法治與社會秩序的必然結果。該黨雖以「民主」為名，實則與民主價值毫無關聯，長期掛著「監察政府」的招牌，實際上卻成為外部勢力的政治代理人，屢次藉「民意」之名行破壞之實。民主黨與反中亂港分子沆瀣一氣，公然挑戰國家主權與安全，其行為不僅損害香港的根本利益，更嚴重影響市民的福祉。

回顧歷史，民主黨的激進化早有端倪。2014年非法「佔中」運動期間，該黨多名成員積極參與，逐漸與激進勢力站在同一陣線，將香港推向動亂邊緣。到了2019年修例風波，民主黨議員更變本加厲，不僅在街頭為暴徒打掩護，阻礙警方執法，甚至長期利用立法會和區議會，阻撓政府施政，嚴重破壞香港的法治與社會穩定。許智峯、林卓廷等人更被揭發在騷亂中發揮組織與策劃作用，試圖顛覆特區政府的管治。

為虎作倀 棋子變棄子

在香港選舉制度完善後，民主黨對選舉的態度更暴露了其反對派本質。2021年，羅健熙與前主席劉慧卿等人開始散播「選舉無用論」，試圖削弱香港的憲制秩序。同年9月，當美國媒體抹黑立法會選舉時，羅健熙等人立即配合，阻止黨員參選，甚至向尋求民主黨支持的黨外參選人發出長達6頁的「問卷」，要求對方承認一系列反政府訴求，以政治審查的方式操控選舉。這種行為不僅違背民主黨自身所宣稱的「民主原則」，更直接證明其已完全淪為外部勢力的工具。

民主黨的內部分裂與衰落亦是不爭的事實。自羅健熙接任主席後，該黨由立法會第一大黨淪為議席「清零」，但他不僅沒有反思，反而揚言要將民主黨轉型為「壓力團體」，甚至多次撰文唱衰香港，抹黑完善後的選舉制度。這種不負責任的領導，使民主黨內部早已四分五裂，黨員紛紛流失，組織陷入崩潰邊緣，與其說是主動解散，不如說是自然消亡。

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助香港反對派逾4.6億港元，其資助模式與在烏克蘭、格魯吉亞策動「顏色革命」的方式如出一轍。而近期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被揭露長期從事顛覆活動，民主黨在此敏感時刻解散，這種「同步性」顯然不是巧合，這也再次證明香港的反對派並非真正代表市民利益，而只是外部勢力的棋子。

撥亂反正 香港恢復繁榮穩定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民主黨的歷史角色實為負面教材。該黨在立法會內惡意「拉布」，拖延多項民生議案，直接導致2016至2020年間香港的重大工程項目延誤率飆升68%，公屋輪候時間突破6.1年歷史高位。此外，該黨在議會內部享受公帑資助時，卻頻頻策劃抗議行動，誤導市民對政府政策的理解，甚至煽動違法，鼓吹「違法達義」的危險論調，使社會分裂進一步加劇。2019年，香港的青年犯罪率飆升42%，與民主黨大力推動的激進政治氛圍密不可分。隨著該黨消亡，社會已回歸理性、穩定。根據教育局的數

據，2023年學生參與國民教育活動的人次較2018年增長三倍，而社區組織「地區關愛隊」亦在半年內成功調解過千宗鄰里糾紛。

對於所謂「政治打壓」的論調，事實是最有力的反駁。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市民的合法權利不但沒有受損，反而受到更充分保障。司法機構依法審結「35+」串謀顛覆案，彰顯法治正義；2023年公眾集會申請通過率創十年新高；IPO排名重回全球第四，顯示國際資本對香港法治環境的信心。這些事實充分證明，只有清除反中亂港勢力，才能真正實現更高質量的法治與自由。

民主黨的退場既是法治的勝利，更是人心的選擇。在新的政治秩序下，香港不僅不需要民主黨，更不允許類似組織再度興風作浪。該黨的消亡，恰恰為香港由治及興掃清障礙，讓社會擺脫長期以來的政治內耗，真正步入穩定繁榮的新時代。站在由治及興的新起點，我們堅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徹底告別政治亂象的香港，必將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過程中再創輝煌。

完善安置支援配套 穩步落實「簡樸房」

葉傲冬 民建聯秘書長



香港地少人多，房屋問題長期困擾市民，如何解決房屋問題成為歷屆政府的重點工作。現屆政府秉持「提量、提速、提效、提質」的施政理念，大幅提升房屋供應，並推出「簡樸房」政策以取締劣質劏房。若政府透過完善經濟、安置等支援和政策，同時彈性、分階段、多管齊下地實施計劃，相信定能大大改善基層市民的居住環境，逐步告別劣質劏房，從而推動社會共融發展。

為減輕基層市民負擔並實現「簡樸房」的平穩過渡，政府需提供更完善的經濟配套措施。「簡樸房」

政策可能導致合規單位的租金上漲，政府應加快立法規管「起始租金」機制，避免業主將改裝成本轉嫁租戶。同時，需大力宣傳和推廣「簡約公屋住戶特別津貼試驗計劃」，令有需要住戶獲得一次性的搬遷津貼，並延長此計劃的試行時間，擴展申請條件和涵蓋範圍，以緩解更多受影響家庭的經濟壓力。

政府需提供進一步完善安置政策及過渡性支援予基層市民。基層租戶普遍擔心搬遷至偏遠地區會影響就業與子女教育等，政府應優先為居民提供同區的過渡性房屋或簡約公屋，並加強市區土地整合，例如利用閒置校舍或工廈改建臨時居所，解決市民

的燃眉之急；加快現有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落成速度，並延長居住期限，避免居民短期內二次搬遷；政府需優先為弱勢群體，如長者、單親家庭或殘疾人士等，分配簡約公屋或過渡性房屋，並整合社會資源，提供搬遷協助、就業轉介、子女轉校服務，建立「一條龍」的搬遷支援服務，並設立專責部門處理安置產生的糾紛問題。

對於環境更惡劣的床位和無間隔的板間房，政府亦應考慮納入規管。為此，可制定「人均居住面積」標準，如每人不低於5平方米，避免家庭成員過多導致空間不足；對於工業大廈劏房等特殊案例

需另訂規範，而非統一適用8平方米標準，避免「一刀切」。

為避免影響市民措手不及，政府應採取「分區、分階段」的策略，循序漸進地推進計劃。此舉可避免在某個區域集中取締劏房，例如先嘗試分區優先處理危樓密集的油尖旺區，按樓齡或違規程度排序分階段執行，以減少市場震盪；據2024施政報告指，未來五年將新增18.9萬伙公營房屋，政府可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逐步引導人口至新界，同時緩解市區的擠迫問題。

「簡樸房」不僅是居住空間的升級，更是特區政府對市民關懷的體現。政府若配以「組合拳」的策略，定能打破香港房屋問題的困境。希望有需要市民都可以積極參與政策，共同見證香港由治及興的轉變，令每個香港市民都享有一個舒適、有尊嚴的家園。